

玄奘传二种

王其兴 主编

慧禅 总策划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渊雷

宋云彬 著

孙毓修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

慧 禅 总策划

王其兴 主编

玄奘传三种



苏渊雷

宋云彬 著

孙毓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奘传三种/孙毓修,宋云彬,苏渊雷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王其兴主编)

ISBN 978-7-208-07557-3

I. 玄... II. ①孙...②宋...③苏... III. 玄奘(602~664)—传记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7017号

·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 ·

玄奘传三种

王其兴 主编

孙毓修 宋云彬 苏渊雷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3 字数 184,000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978-7-208-07557-3/B·627

定价 15.00元

总策划: 慧 禅

主 编: 王其兴

编 委: 盛巽昌 潘文彦 凌志国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上海德泓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总 序

慧 禅

一、正确认识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出现的宗教，它产生在印度，发展在中国，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两大东方文明古国的思想结晶，起初只在亚洲流传，现已遍及全球。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统计，全球佛教徒约有六亿人。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是当今社会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

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和种姓制度（种姓分四：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后来又分出社会地位更低的“贱民”），他主张众生平等，否定创世主的存在，提倡无神论。但是，印度佛教在后来演变发展过程中，释迦牟尼逐渐被神化，特别是六至七世纪时期，印度兴起密教思潮，终于将印度佛教改造成为神秘的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用神仙方术去理解和接受佛教，将佛看成神。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走过了初传期、发展期、鼎盛期、衰落期四个阶段，经历了神学化、人学化、经院化和世俗化四个历程，佛教终于从神坛走向人间，从超世脱俗来到现实世界，可以说，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演变过程，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是由人学蜕变为神学；后者是神学走向人学。

实际上，真正的佛教就是人间佛教。惟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佛教才有生机，才有活力，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释迦牟尼在人间创立佛教，那么，佛教本来就应该“人间”的。所以，佛在人间，觉悟在人间；佛法也在人间，佛法即是佛在人间

的教化。教化不是宣传,宣传是灌输,教化是启迪智慧。

佛教对待宇宙人生的态度,既不是唯物论者(“色即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不是唯心论者(虽然,佛经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里的唯心与哲学上的唯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家所说的唯心,在佛学里称为意识。佛教所说的唯心是见分和相分的统一体。可参读唯识学),更不是唯神论者(前已述及,佛陀是人世间的觉悟者,不是创世主,也不是世界的主宰神。所以正信的佛教徒应是无神论者),佛教是因缘和合的缘生论者。这里所说的因,佛经里叫亲缘因,属平等因,是事物的根本;这里所说的缘,佛经里叫增上缘,是条件(可参看《百法明门论》)。佛教认为:世界上所有精神的、物质的事事物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从而也就推定了世人皆知的因果律。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这在佛教的唯识学中有详细而透彻的论述,唯识学是一门心物结构的学说。

佛教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分析历史,考察世界的现实,认为宇宙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始无终,因果相续,因缘合则生,因缘散则灭。我们就应该也能够把心量放到无量无边的大,与真如世界相契合,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破除法执和我执,真正领会宇宙人生的真谛,从而达到“无我”的境界——佛的境界。佛,就是觉悟者。这就是佛教全部理论中的核心要义。

诚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无常的,佛教认为无常即常。佛教所想实现于现实世间的,就是本着彻底而完善的正觉,适应时机,随顺当时、当地、当机,无不恰到好处。否则,实现于人间的佛教,就会成为一种空论、一种妄想。佛教讲得最多的,论述得最多的,而又最为世人误解的“空”,也就是空去我执的烦恼障和空去法执的所知障,并没有否定世间万象的意思,正是把我执、法执的斥除过程,始终置于人生世间。如果离开了人生世间,人生就难以觉悟,信仰也就失去了生命。依照这种世间觉悟的思想观念,当今人间佛教就可以其人道慈悲的宗旨,契合众生的心灵,以整个时代为当机,着眼于现代社会,

可以科学的、理性的、民主的、平等的身相，呈现于佛教。这不仅符合佛教菩萨四摄法道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得以践履的正途。

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广义上说，佛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包涵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而精彩的外来文化。当然，文化是不能封闭的，也不应该封闭。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旦相遇，就会碰撞、交汇、激荡、融合而产生出新的令人耀眼的光辉。像其他任何外来文化一样，佛教也一定要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才能得以在中国植根、生长、演化，而有成果。佛教的文化在中国两千年中，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作为历史的载体，今日回顾，仍然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明显地观察到佛教的印痕，不少方面，可以看到其影响是根本性的。

文学方面，中国的古典名著，不论是分分合合的《三国演义》，或是英雄聚义的《水浒传》，《西游记》当然更不必说，或者是官宦人家豪门宅第的《红楼梦》，以及志怪小说、民间话本，虽然是题材各异，大都充满佛教的义理。因为优秀的文学必须获得对生活对人生的真正理解，肤浅的喜怒哀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不能仅仅拘于文学是情感的表现的机械命题，而忽略了文学还须蕴含人生哲理和反映时代的历史责任。

同样，唐人诗歌由于大量蕴含哲理的佛门诗偈的涌入，推动了哲理诗的发展，一扫伤春悲秋的愁绪，出现大量禅诗，留下一片清凉世界，人间处处皆净土，大大拓展了新的审美领域，被文学史称为诗歌的革命。

在美学上，无论是绘画、石刻、彩塑，佛教艺术给我们留下无与伦比的辉煌艺术珍品。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四川大足以及精致非凡的承德外八庙，这些艺术珍品是佛教洒落在中国大地上一点点璀璨的瑰宝，它们的艺术风范，是后人无法企及，也难以模仿的。如果我们再一次聆听这些古老

艺术珍品遗迹的倾诉，我们会受到惊心动魄的震撼。对于现代艺术界来说，这是历史的珍品，从中有可以借鉴学习的无穷的宝藏。

在哲学思想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玄学相结合，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哲学思潮，到了宋明理学的发展，佛教从神坛走向人间，而与儒家的伦理哲学合一，成为儒化的佛学，直到清末民初，一批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时代精英，首先选择了佛教，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很明显，康有为的《大同书》所依即是佛教四谛说，谭嗣同的《仁学》，被人称为“应用佛学”，用的是华严宗圆融无碍，一多相容的教理。梁启超，堪称近代大思想家、著名学者，他的佛教专著很多，他明确指出：“佛教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并以此六大特征，表明佛教的积极性，可以救国救民救心。明确表示，“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当时及其后的一大批志士仁人，都十分赞赏大乘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精神。“五四”大潮过后，更多文人（恕不一一列举）反观佛理，进行深刻的思索，在寻求中国文化建设的新路，知识分子信奉佛学，也是因为他们意在以佛家思想作为他们构筑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

综观上述诸多方面，可见：

佛教是一种思想，一种正大光明，教化人类净化心灵，创建人间净土的思想；

佛教是一种信仰，一种具有永久性，普适性和必然性的正确信仰；

佛教是一种文化，传承着两大文明古国基因的、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充满活力的、契应时代精神的文化；上世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么说：“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宗教能够解答科学上提出的问题，这个宗教一定是佛教。”

佛教是一种哲学，被恩格斯称为“佛教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阶段上”的哲学。

三、文化兴教,文化兴寺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必定是落后的、愚昧的,无法以自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宗教,也必定是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或者虽有一时的兴起,但必不可能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性的大宗教。佛教创立两千五百年来,历尽磨难,却越来越发展。如今已赢得全球六亿多人的信仰。信仰必须有理论做支撑,要建立在认识深邃的理论基础上,信仰才坚定不移,才是永久性的。缺乏理智之魂,易于激动,易于盲从,易于迷信。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佛教,理性地看待宇宙人生,理性地看待当今社会,用人间佛教的理念,观照世间,在净化自身心灵的同时,为净化社会,为建立理想的人间净土作出贡献。因此,人间佛教必须提高自身的品格,必须提倡佛教的正知、正见、正解和正信。

鉴于上述原由,云翔寺计划组织有识之士,共同编撰有关佛教文化系列丛书,初步拟订为:

一、佛教人物传记,历史上的高僧大德的大无畏坚毅求法弘法精神,以此激励后人,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人间佛教的教义教理,兼顾普及和提高,在弘扬慈悲精神的前提下,契合当今社会现实,用“当相即道”的理念,从现代的人生化、社会化、理性化为基础,修持人间佛陀,实现我们的目标——人间净土;

三、云翔寺创建已经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上曾经大有建树。因地处南翔,属上海嘉定地区,所以有关嘉定地区的佛教遗迹、佛教掌故、民间传说,作为我们丛书的又一个方面,出版一些趣味性和可读性较强的通俗读物。

我是僧人,深知要兴教,必有赖于文化,要兴寺也必有赖于文化。但毕竟所知有限,识见浅陋,愿望虽如此,付诸实施困难多多,丛书陆续出版中有望高人不吝赐教,诸多方面同仁惠予指正,这是我衷心祈盼的。

代序 玄奘与时代精神

钱文忠

也许,不少人知道,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讲了“玄奘西游记”,节目长达三十六集,首轮于2007年9月30日全部播出完毕。由于“百家讲坛”在电视观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的讲述似乎也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相当关注。近来,上下两册的《玄奘西游记》也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上市不到两个星期,各方面的反应也很热烈,列在各种排行榜的前列。我在欣慰之余,也明白,这是观众和读者对我的厚爱,我深深地感激。

玄奘是生活在距离今天大约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代高僧,他不远万里,西行求法,求回真经,埋首翻译。无论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还是在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史上,甚至在印度的古代历史上,玄奘都具有顶尖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

就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玄奘西行的足迹遍及西域、中亚,那里正是人类文化上一块独一无二的宝地。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个最大的文明,而这四大文明的会聚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包括中国新疆的大部分)和中亚。这片舞台丰富多彩,光怪陆离,交流频繁,冲突激烈。你方唱着,我就登场。这里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极其富有成果的,由此向四周发射出巨大的冲击波。然而,由于民族迁徙、战争攻略、环境变迁等等诸多原因,有关这片广袤的土地的历史资料却少得可怜。玄奘应唐太宗之请,和他的得意弟子辩机合作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正是有关这个地区的最最珍贵

的材料。

至于玄奘在中国和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地位，那更是不消说的了。先说中国佛教，他培养了很多学生，和助手们翻译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重要的佛经，其中很多是最权威的译本，不少是最流行的译本。他将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水平的学说带回中国，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也叫慈恩宗。由于玄奘对佛学的贡献实在是大，他受到了唐朝皇室的特别的尊崇和礼遇。这些我在“玄奘西游记”里，都有所讲述。为什么说玄奘对印度佛学也有很大的贡献呢？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玄奘长时间地留学印度，在印度广泛游历请教，他接触的多是当时印度最具声望的学者，他掌握的乃是当时印度最高水平的佛学理论。印度当时的不少学说在本土失传了，靠着玄奘的汉语译本方得以保存至今。可惜，玄奘的几种用梵文写成的著作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不然，玄奘对印度佛学的贡献就可以看得更加直接了。

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当然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唐西域记》，其中关于印度的记载弥足珍贵，无可替代。印度文化固然有它的极高成就，但是却并没有信史的传统，可靠的历史记载是寥若晨星，非常稀少的。这一点，马克思就曾经提到过。印度不少学者就说过，没有玄奘的记载，重建印度古代史是不可能的；有的印度学者甚至说，印度历史欠玄奘的债，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事实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确实成了重建古代印度历史，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手册”。玄奘的记载的准确性，早就被大量的根据他的指引而进行的考古工作的成果所证实了。

上述的这些，还只不过是玄奘的历史贡献的最粗浅的大概。不过，我确信，这已经足够证明玄奘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了。然而，这却并不能够阻挡大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算的确如你所讲，玄奘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而伟大的人物，可是，离开我们那么遥远的他，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又有什么关系呢？玄奘能够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说心里话,原先我对类似的问题不仅是不理解的,甚至还有相当的抵触:学术就是学术,特别是有关古代的学问,何必非要和现在发生什么关联呢?而现在,我的想法发生了一点改变。当然,我依然还是坚持学术必须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不应该过多地,或者说首先考虑和现实有什么样的关系,须知,人类的知识探求和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分地要求“立竿见影”,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正应了“欲速则不达”的话。

但是,学者们似乎也不妨偶尔将脑袋探出象牙塔,看看外面的世界,关系一下自己也处身其中的当下。至少应该考虑下,在选择古代的研究对象时,是否可以优先选择对当下的时代有所影响或者启示的呢?我想,这和学术独立并不冲突。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绝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够局限的,一定可以超越他所在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生存环境,超越时空,焕发出弥久弥新的永恒的价值。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得到精神层面的启示。无疑,玄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我应该努力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了:玄奘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大问题,自然不可能在这里完全地说明,我只能就下面几点,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请大家指教。

首先,可以很明确地说,玄奘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乃是为了追求真理,不避风险,面对各种挑战,绝不退缩,甚至不惜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危险。玄奘是个虔诚的高僧,在他的心目里,佛法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这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加以什么说明,更没有必要为玄奘做什么辩解。我比较赞成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也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应该超脱于它的具体环境,而重在继承其精神。玄奘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不惜偷渡出境(这一点在今天当然没有必要了),经受了诸多严酷的考验,不少时候几乎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西游记》里讲,玄奘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这固然是小说家之言,但也未必就不是真实历史的一种折

射或者反映。我想,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必须具备的。

其次,倘若我们仔细观察玄奘在印度的留学生涯,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我们都知道,玄奘不仅是一个佛教徒,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弥勒信徒,他到印度就是为了追寻心目中至高的经典,据说是弥勒菩萨口授的《瑜伽师地论》。在印度,玄奘不仅找到了这部经典,还找到了再理想不过的老师——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寺主、大乘有宗的最高权威戒贤法师——,以我们对宗教信仰的普遍的理解,玄奘应该满足于此了,不会旁及其他学说了,不会越雷池一步了。可是,历史事实却正与此相反。玄奘并没有满足于学习《瑜伽师地论》,也没有满足于跟从最高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甚至也没有满足于本来就已经可以提供多种知识学说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环境,而是在印度广为游历访学。因此,玄奘的学问绝不局限于瑜伽行派,而是涉及了当时印度的大量学派和学说。实际上,玄奘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我们可以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之路,本身就是一条学习之路、探索之路。玄奘充分展现了专精而不封闭,开放而有所守的学习态度。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徒来讲,是特别不容易的。

第三,玄奘是完全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停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圣地印度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玄奘还是选择了回国。也许,大家会说,玄奘既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终究会有一种“回向”的意识,将学得的佛学知识“回向”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人们,乃是一个高僧的份内之事。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大家别忘了,玄奘也很可以选择在印度进行这种“回向”,此外,还有好多别的国家请求玄奘驻留弘法。最重要的一点是,玄奘当年是违反禁令,偷越国境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回国以后是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从历史事实来看,他显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而是在机缘合适的时候,马上起程回国。实际上,他是无法预料回到国内后等待

他的会是什么的。从历史看,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国际性的,但是,同时又必须是民族性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简单地说明白的。玄奘无疑做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统一。

第四,玄奘学有大成,又确实和当时的帝王唐太宗特别的有缘。从历史的记载看,唐太宗也确实希望玄奘能够还俗,出任官职。然而,玄奘拒绝了。很明显,玄奘的心愿是“单身行道”,根本就没有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求来的学问,当作世俗之门的敲门砖,或者“货于帝王家”。这一点,就使得玄奘和中国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判然分开了。玄奘看重知识的独立性,看重知识的本身价值,不认为知识是某种交换的工具。他不仅没有出任任何世俗的官职,而且也没有以一代高僧的身份地位出任过僧界的重要高级职务,只担任了慈恩寺的方丈。这一点是很特别的,也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不好理解的。《西游记》就是例子,里面讲唐太宗请玄奘还俗被拒绝,就封了玄奘“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这样的官职是杜撰的,但是也正反映了一般人的心态。在具体的问题上,玄奘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时候甚至会毫不理会皇帝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玄奘一回国就受到了未必在自己意料之中的热烈的欢迎,而从一开始,玄奘就有意识地避开一切热闹的场所,孤寂自守。这样做当然有回避妒忌、绕开矛盾的考虑,也是玄奘谦虚自抑的优秀品性的反映,但是,更主要的是,玄奘自始至终就抱定了“单身行道”的信念,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是玄奘身上特别的闪光点。

第五,玄奘是一个僧人,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顾自己修行的僧人。他有超常的组织能力、教育能力,总而言之,玄奘是一个很有实际能力的人。我们都知道,玄奘是人类历史上顶尖的翻译大家,他的翻译开创了我国翻译史的新时代,在佛经翻译史上更是“新译”的开山祖师。玄奘翻译的数量之大、难度之高、权威之坚、流传之广,罕见其匹。这样的工作,当然不可能是由玄奘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必须有某种组织机构的保障。玄奘就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

他将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译场”加以改造完善，将分工更加细化，更加明确化。译场里的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分工，也有不同的责任，而彼此之间又是一个相互配合的有机互动的结构。集体合作翻译，在今天当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是，如此详尽的分工和结构，却只有玄奘做到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并不简单地满足于自己成就巨大的翻译工作，还从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翻译理论，这就是翻译学史上著名的“无不翻”。在今天，这套理论依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玄奘和时代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去探索、去研究，不是像上面那样看似简单明了地概括出几点就可以交代的。我讲的只能是个人非常粗浅的一点思考和想法，希望能够多少发挥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前，“玄奘精神”、“重走玄奘路”已经成了流行的时代话语，可是，这里面究竟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和精神财富，恐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里有一段话，永远不会过时，我愿意用它来结束这篇“代序”：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问，今天正是需要脊梁的时代！

目 次

总序	慧禅
代序 玄奘与时代精神	钱文忠
孙毓修 玄奘	
宋云彬 玄奘	
苏渊雷 玄奘	
附录 玄奘行年纪事	
后记	盛巽昌



玄奘

孙毓修
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1月初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